

#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2月2日 第B4版)

## 二、硝烟

在协和从医从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现非凡，专业出众，且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当时的副院长狄瑞德医生在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李医生是内科中国医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临床和研究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种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可以影响而带动其他人的人。我深知，在协和的年轻中国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海人不倦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因为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授。”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也就是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邀请协和医院的李宗恩、北平护士学校的杨崇瑞校长（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四人，一起讨论，决定在武汉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并指派他们为筹备人。但因华北形势动荡，会议草草结束，各自回原校分头筹备。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来的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仍由李、汤、杨、朱负责。11月19日，李宗恩离开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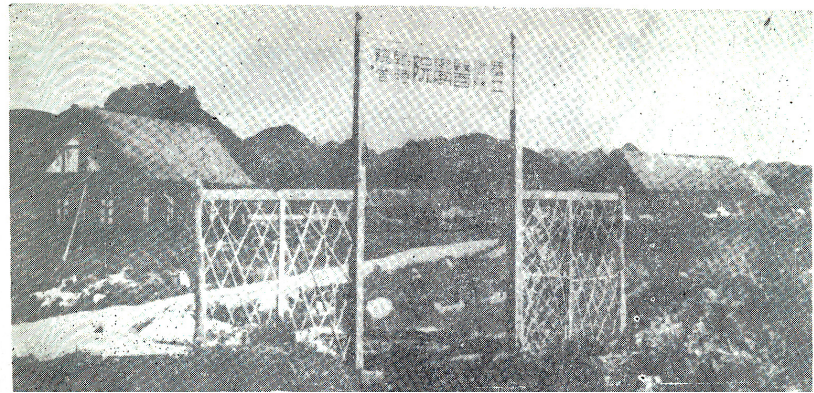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为院长。校方顺利地租赁了别墅、会馆以及寺院，经过修缮，6月1日贵阳医学院正式上课。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三百余人，他们来自三十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

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实行类似协和的导师制。导师及受导学生的分配，在每学年开始后二周内由训导处公布，导师负责受导学生学习、生活之责。这种导师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续到1949年。一个学生曾这样形容在贵医的读书生涯：“开办之初，设备简陋，没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树枝上讲演。一些教室也是临时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寝室往往变成泽国，没有自修室，在饭厅里自修，每人发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处跑。天晴的时候，还好；一逢下雨，泥泞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年级宿舍是在山上，离开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山上常闹豺狼和土匪）。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学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的骨骼。在物质条件如此低劣之下，师长们海人不倦，同学们埋头苦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均荟集在此，贵阳医学院声誉鹤起，遂有小协和之称。”

两年后，贵医的学生毕业了！1940年2月2日首届毕业典礼在敬思楼举行，医科第一届毕业生二十六人，医士职业科毕业生第一届护士十六人、助产士十一人。典礼上，男着中山装，女着旗袍。毕业生也是穿着整齐，或黑色中山装，或白色制服。会场布置庄严隆重，校门有松柏彩牌耸立，两侧书有楹联：“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与会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厅长、大夏大学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等。典礼在乐曲中开始，李宗恩致词。他说：

“我热诚地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觉彼此相处的日子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来贡献给诸位。

我们无论求学、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我对于科学态度的解释，认为应该是避免主观，注重客观。主观太强，理智容易给感情蒙蔽，会不知不觉走入错路。注重客观就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才可以充量运用他的智慧来求学来办事，才会有良好的成就，才会有不断的进步。就是处世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恰



创建初期六广门外临时校舍大门  
(一九三九年)

讨自己，体谅他人。这种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的生活风格，实在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应有的修养。”

“求学办事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会宗教信仰是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有人说，主义信仰也可以成为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作艰苦的奋斗，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义信仰的人一样。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心境永远是乐观而且积极的……”

我反复阅读这篇致辞，感慨良多。与其说他是在勉励学子，不如讲是在归纳自己——“无论求学，无论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李宗恩不正是这样办学的吗？“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的生活风格”——李宗恩不正是这样生活的吗？“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达到了这样的境地吗？最令我钦佩的是他的这种人生态度贯穿于生命之始终。即使在“反右”之后，“山巅秀木，摧折为薪”。对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来说，内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依旧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觉得李宗恩的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实践，有如广袤高原上的冬雪，绵长

细密，无声无息又尽心尽力。

临床是医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为了让贵医有临床教育，李宗恩和杨济时筹集了部分资金，在贵阳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因陋就简，设置十张病床，成立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由杨济时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学生的教学实习和临床实习都有赖于省立医院。医学从来都是严谨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为消解学生日常生活里的冗繁、干枯与琐碎，李宗恩居然组建了一支口琴队！用节省下来的院长办公的经费，在香港订购了各型口琴。经过训练，没过多久，什么《比翼鸟》、《双鹭进行曲》、《汉宫秋月》等乐曲，都不在话下，还定期在贵阳市内公演和电台表演，且成为贵阳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队。继而他又建立了话剧队，国剧队。前者，为贵阳市捐献慰劳筹款公演，自己还参与《叔叔的成功》等剧目的演出。后者，为劳军、赈灾、募捐等义务也演出多次，剧目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风流尽显，旧时代一个受教育充分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个性之饱满充盈，令人感佩。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医学院，在硝烟中越发显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观。有如一条缓慢的水流因高压而成为壮观的喷泉，在战争阴暗的缝隙中迸射出一线夺目的光亮！

——待续——